

民进党“中国政策研讨会”评析

朱 天 顺

1998年2月13日至15日,民进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国际会议厅举办了“中国政策研讨会”,各大派系推出代表36人,非正式代表5人,提出论文31篇,就三个议题,即“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新秩序对台、中关系的影响”、“台、中双边协商与互动关系的策略规则”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挑战与因应对策”,进行了辩论。

三天的辩论,实际上是主张以经贸为主线,“大胆西进、立即开展三通谈判”的美丽岛系和主张“强本渐进、戒急用忍”的以新潮流系为主的其他三系的对辩。从辩论中可以看出,至今为止,除了依据《党纲》把两岸关系定位为“一中一台”的国际关系以外,民进党中央并没有通过得到全党认同的大陆政策。台湾《民众日报》1998年2月14日社论说:“民进党成立十一年,除‘台独公投党纲’外,并没有什么中国政策或大陆政策;对于中国一向采取回避或排拒的态度,直到八十五年(1996年)总统初选期间,美丽岛系龙头、民进党主席许信良主张‘大胆西进’、‘政经分离’卯上非美丽岛系彭明敏的‘戒急用忍’、‘政经难分’后,才逐渐浮现”。这次辩论中歧见颇多。可以看出,民进党大陆政策之所以难产和具体策略上歧见纷纭,其根源在于党内对于构建大陆政策的三个基础因素缺乏统一的认识。这三个因素是:1.主体因素,包括民进党本身的诉求和关于台湾主体力量的评估;2.关于国际形势影响两岸关系的判断;3.对中国大陆形势的研判结果。各派系提出的大陆政策,都是在评断上述三个主要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观察民进党内部关于‘中国政策’的分歧。

一、由于对主体因素的认识差异而带来的政策分歧

主体因素是民进党制订“中国政策”的出发点。在这次研讨会上,由于各人对“台独公投党纲”,存在着主观理念上的差异,所以,就在关于“台独”的实现策略、两岸关系中的主权纠葛问题上,出现了突出主权问题的强硬主张和模糊主权问题的务实主张的分歧。不但如此,凡是可纳入大陆政策这一范畴的各个领域,如对待两岸谈判的态度、谈判议题的选择、开放三通的条件、两岸经贸政策等,其产生分歧无不和各派系或各人的“台独”观念和主观诉求的差异有密切的关系。在有关两岸谈判方面,固执于“台独党纲”者如张旭成,认为“民进党的立场应该是要求北京承认两岸是两国,一中一台的事实,在这基础上进行对话。”(注:引自民进党中央党部编:《民主进步党中国政策研讨会与会代表书面意见汇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

编),345页。以后引文未另注出处者,均引自此汇编,只记页码。)周伯伦说,“应以国家与国家的形式进行‘准交战国’之间,为化解战争可能性的谈判。”(25页)在研讨会上,“颜锦福强调,我们不需回避主权来进行谈判,反而要在谈判时,刻意强调主权立场,即使被国际认知台湾是一‘麻烦制造者’,亦无不可。”^①与上面的观点相反,在两岸谈判上想回避主权问题、务实面对者,如姚嘉文,认为台湾与中国大陆进行谈判已是不可避免,“目前对‘国家定位’之议题不可能进行谈判,只有间接及实际面临的议题,不应谈及‘国家定位’‘主权归属’之类议题。”(3页)邱义仁、吴乃仁的论文提出:“不论是谈判、协商或对话,我们主张要把握三项原则:1.诚信;2.开放;3.现实”,“以开放的态度厘定协商项目”,避开了主权问题。(38~59页)成为各派辩论对手的美系许信良、陈忠信的主张是:“必须避开主权摊牌的谈判议题”,“以三通谈判取代政治谈判”。(未有页码,见论文第二节)

在两岸三通问题上,要求中共承认“台湾主权独立”为前提者,也颇有其人。如蔡同荣批评许信良的主张,自称“并非反对三通,而是能拖即拖,不需主动提出三通谈判。而谈判时,绝不能搁置主权,两岸过去签署的协定,中国一直坚持主权,所以台湾若提出搁置主权的谈判,是自己放弃主权,世界各国如何支持台湾,所以搁置主权的的主张是一极危险的主张。”^②周伯伦主张:“在中国不承认台湾主权独立的前提下,不应全面放宽中国货物来台及逕行直航,如此才能累积台湾与中国日后谈判的筹码。”(28页)

从上面的引例中可以看出,民进党“台独党纲”对其制订大陆政策的影响。民进党中央至今不能制订出全党通行的大陆政策,恐怕就是因为受到上述党内分歧的困扰所致。党内谁也不愿公然向维护“台湾主权独立”的主张挑战。施明德称,“此次‘中国政策研讨会’的召开,三十余篇报告文中,可以显示全党没有人否认台湾是独立国家的观点。”^③虽然人们对于实现“台独”的形势、途径、策略、时机等的看法不同而产生分歧,但谁也没有离开维护“台湾主权”的立场。有一部分人认为,在处理两岸关系时,避开主权问题,既是维护“台湾主权”的好办法,又能顺利构建两岸协商、谈判机制,有利营造安定、互惠的双边关系。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要维护“台湾主权”,就要迫使中共承认“一中一台”为前提来处理两岸关系,不然有被并吞的危险,等等。虽然,三天研讨的结果,说是得到要进行“全方位谈判”的共识,但在有关“台湾主权独立”的诉求处理上分歧依然存在,并没有整合出全党一致的解套办法。会前陈水扁就表示,这次会议“只不过是新年后另一场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的热闹活动,不可能有结论,外界也不要要有太高的期望”。^④

形成大陆政策之基础的主体因素中,除了民进党解决两岸问题的主观诉求和推动力之外,还包括两岸互动中起作用的台湾社会力量,包括自然条件、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资源。在研讨会中,各派系都把对上述因素的研判当做决定大陆政策的论据。对上述因素在两岸互动中的作用的估量和重视程度的差异,也常成为两岸政策分歧产生的根源。上述因素中常被当成筹码或政策依据者,主要有:

1. 把台湾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当做筹码,认为台湾是西太平洋岛链的一环,扼据台湾海峡通道,对美国围堵中共和日本保证能源通道畅通来说,台湾都不能落入中共之手,日、美将保护台湾安全。因此,认为在处理台海两岸关系问题时,不应为中共不放弃武力威胁所左右。在会上,这一论调,被主张后冷战时期已形成世界新秩序和中美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的论点所质疑。

2. 在政治筹码方面,常被运用的是所谓台湾的“主权独立”和“民主”。朱铜树、邱奕彬、邱议莹共著的论文说,“事实上台湾真正的筹码只有两个:一是主权,一是民主,从柯江会谈的两个僵局:台湾问题及人权问题即可看出端倪。台湾只有坚持主权,标榜宣传及持续地民主化,才有可能得到支持。”(265页)有的人则把“台湾的民主”筹码用于不接受“一国两制”、拒绝两岸谈判的理由。“许信良指出,要回避主权议题,的确非常困难,但非不可能”。“如果要谈主权、一个中国,那国民党要求中国接受直选总统、中共民意代表必须直选,中国也吃不消。因此,台湾不要怕谈判。”^⑤由此可知,许信良先生也承认台湾的“主权”和“民主”也是处理两岸问题筹码,但他认为,为了不阻碍两岸谈判,可备而不用。由于国际上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对抗冷却下来,台湾的“务实外交”的业绩又不佳,加上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是两岸经贸问题,所以台湾的政治筹码运用问题并未被深入研讨,因而未出现明显的分歧。

3. 在两岸互动中,台湾的军事力量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对这个问题的估量不同,也是大陆政策产生分歧的一种因素。一般认为,在两岸军事对峙中,台湾应采取守势。颜锦福说:“台湾国防力量对付中国应无安全之虞。”“应提高警惕,加强国防武力装备,……叫敌军不敢越雷池一步才是上策。”(129、130页)有人则以军事力量为筹码,认为安全有保障,应把“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坚持到底。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两岸互动中应避免挑起事端“激怒中共”,特别是对于宣布“台湾独立”和“公投”,应采取慎重态度。多数与会者都以“台湾在事实上已经主权独立”为口实,认为“在此前提下,台湾并无必要甘冒国际大不讳,不顾一切宣布独立,刺激中国对台采取激烈对抗,让好战派有挑衅的藉口。”(67页)因为台湾用武力对抗中国大陆的筹码不足,多数民进党人都从“尖锐的追求台独”立场,退到赞同国民党现行的“独台”路线。“邱义仁指出,经过三天的辩论后,大家一致认同与中国谈判必须要严肃面对,在主权问题上,绝大多数意见也支持台湾是一主权独立的国家。”^⑥许信良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民进党台独党纲的落实,一定会考虑国家安全、人民安全、主观条件以及后果评估后再决定如何落实,民进党是负责的政党,虽然台独列为党纲之中,但不会草率执行。”^⑦研讨会以前,“民进党秘书长邱义仁即曾说,万一台独引起两岸开火,民进党亦可不主张台独。”因为中共对台使用武力前提之一是台湾脱离祖国搞独立,而民进党内对于台湾的防御力量有疑问,所以多数人从“尖锐的台独”诉求,向“现状的独台路线”转向,是必然的。

4. 台湾经济筹码在两岸互动中应用的分歧。这次研讨会主要议题之一是两岸经贸政策问题,所以会上摆出的台湾经济资料也比较多,研讨会上的分歧除了出于对大陆情势评估的差异之外,主要是因为对台湾经济的体质、规模、发展前提,以及如何在两岸互动中运用经济筹码,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另外,还有对过去十年两岸经贸成果评价上的分歧。许信良提出的“大胆西进,直接三通”的主张,主要是建立在世界经济潮流和台湾经济优势的基础上的。“大胆西进派”相信台湾经济体质的优势(高科技,资金和管理经验丰富)在两岸经贸互动中的作用,认为西进在中国大陆发展经贸,不但不会产生对大陆的单向依赖,而且能够“经营中国”。张俊宏对台湾经济力量的优势信心十足,提出以亚洲金融风暴为契机,两岸共同参加国际经济合作,“召开亚洲金融会议”“建立亚洲华人经济圈”。^⑧这些主张,受到“强本渐进,戒急用忍”派的批评。其批评的立足点,除对于中国大陆投资环

境的认识上的差异之外,还有对台湾经济基础的看法不同。邱义仁认为,“新系强本渐进并不是在拖,而是强调台湾的生存命脉在产业升级,大胆西进会使资金掏空。”^⑨苏焕智则批评“大胆西进要扩大中国投资,想‘和平演变’中国的政经战略”值得存疑,美系“建议建立大中华经济圈,将造成台湾被吸纳、台湾依赖中国,……中国已经逐渐发展,若不限高高科技、大企业投资,势将使台湾企业提早空洞化。大胆西进若大力推动,产业空洞化必会加速。”^⑩从上面的争议可以看出,分歧的出发点在于台湾经济体质是否存在产业空洞化的危险,台湾经济在国际和亚洲的地位,以及其经济规模和资金是否足以主导亚洲金融市场和具备经营中国的能力等基本问题上。由此,就产生台湾经济优势运用上的政策分歧,即利用台湾经济的优势去开拓、发展两岸经贸或限制台湾资本流入中国大陆,以免失去优势。另一方面,“戒急用忍”的主张也受到了“大胆西进派”反击。“大胆西进派”提出“管制无效论”和“引导无用论”,批评了“戒急用忍派”的保守做法。总之,民进党内对台湾经济自身的认知差异是多方面的。由这些认知差异结合其他因素,主要是对大陆和国际因素的认知差异,带来了民进党内大陆政策的分歧。由于这些分歧都植根在一些基本问题的认知差异上,并且带有经济理论的分歧,因此如不着重从这方面整合,则难于制订出一个各派能接受的大陆政策。经过三天的辩论,虽然最后取得了“强本西进”的共识,即美系不反对“强本”,新系不反对“西进”,互相妥协,但上述的基本问题的分歧并没有得到整合。

二、民进党内国际观的差异与大陆政策的分歧

“后冷战时期国际情势对台、中关系的影响”是这次研讨会的议题之一,大多数的论文对此议题都有所涉及,在会上也有争论。民进党把国际因素当做制订“中国政策”不可忽视的基础,因此,其政策上的分歧,都和关于国际形势、特别是美国的对台、对中的政策和动向的不同看法,有直接关系。会议集中研讨了:1. 后冷战时期是否形成了世界新秩序? 当前国际形势对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有何影响? 2. 根据美国对中共和对台政策,民进党制订大陆政策时如何因应,才是最有利的? 由于国际观上存在着互相对立的观点,就发生了是否需要积极推展两岸谈判,如何应对中共的“谈判攻势”的分歧;国际形势是否有利于维持“台湾主权独立”和在两岸谈判中是否要强调主权问题。国际上会不会把台湾视为“麻烦制造者”,在两岸互动中要采取和缓或强硬态度,等等。世界经济潮流、WTO对两岸经贸影响如何评估,成了是否开放三通问题争论的焦点。以下是二种有代表性的对立论点。

许信良、陈忠信的论文题目是《在国际新秩序格局下重启两岸关系新纪元》,题目本身就明确地肯定了冷战后国际新秩序已经形成,其主要论点是:1. “在90年代,一个以互相依赖的共同经济利益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开始逐渐形成,取代了过去以互相排斥的个别经济利益为基础的世界旧秩序。”“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架构下,美国已经开始不把中共当成敌人,而是想把中国当成战略伙伴,把它拉入国际体系,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与美国合作共同构建国际新秩序。这是美国当前战略的战略目标,也是美国最大的战略利益所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当然不可能容许台湾在两岸关系上成为‘麻烦的制造者’,美国也当然不会乐见台海情势是持续的僵持、紧张。因此,只要台海情势紧张未除,两岸关

系僵局未解,美国,乃至国际社会,就会‘希望’、‘敦促’、‘鼓励’……两岸以对话、协商、谈判来降低紧张情势,打破僵持之局。”“可以预见,如果美国这一战略目标,也就是与中共这种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得不错,……那么,中国对台湾的主张与要求,美国会愈来愈尊重。换言之,华盛顿——北京——台北的不等边三角形将再向北京一边倾斜,更加不等边。”(见论文第一节)作者根据以上判断,提出“台湾必须积极而正面回应谈判压力”,“以积极的态度掌握先机,正面而主动地以三通谈判为主轴,与北京展开新一回合的互动”,并“按照市场原则,进一步开放两岸经贸关系,使两岸经贸关系成为台湾经济自由化、国际化的核心部分。”(见论文第二节)美系的其他人基本上赞成上述国际观和积极对待两岸谈判的策略。

与美系相对立的国际观和两岸互动的对应策略,有多种说法。吴乃仁、邱义仁的论文开篇就说“没有国际新秩序这回事”,认为“处在这个既冲突又整合,既同一又各自独特的后冷战时代,过早奢言‘国际新秩序’,若非急躁,便是只见到此一时代的某一面向而已,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美国的对华政策:‘战略岛链防线’与‘建设性交往’的两手策略”;“美国对台湾政策:‘提升台湾国际地位’,与‘节制台湾激怒中国’”。“国际社会对台中双方所形成的促谈压力,中国并不会小于台湾。”因此,在两岸互动上,要采取“‘谈判’与‘对话’弹性灵活应用的策略”。林浊水以“强本渐进的中国政策”为论文题目,列出了“大胆西进派”与“强本渐进派”的观点异同。其中“强本渐进派”对各项问题的观点如下:“历史观:历史未定论”;“国际形势:冷战结束,和解与冲突并存”;“安全保障:现实主义的权力平衡或霸权主导体系”;“国际经济:经济国家主义的国际主义”;“台湾危机:国民意识的消蚀、国际地位的矮化”;“促谈压力:存在、并无特别不利”;“对国际社会与中国的态度:持续凝聚国民意识、突破外交封锁”;“自保方案:与中国保持距离,避免被中国‘经济吸纳’”;“谈判主轴:从具体、不具敏感性的议题展开,强化及沟通机制”。(135页)在研讨会上,“林浊水即对许的看法大加挾伐,他说,世界新秩序浑沌未明,和解、冲突并存,而且诸多国家还是愿意提升与台湾的关系,这从中国常向世界抗议的行为,即可窥出‘天平怎会不向着台湾’,因此,国际局势也非完全对台湾不利。至于中美双方签订的‘战略性伙伴关系’,林浊水认为,此举是美方想要藉此一关系,将中国拉到国际安全体系下,进行‘和平演变’中国,以确保台海安全”。^①蔡同荣的观点与美系观点的对立更为突出。他说,“1992年苏联解体后,亚太势力重新洗牌,美国不必为牵制苏联的势力扩张而拉拢日本或中共。对台湾的生存发展来说,美国不必再卖中共面子,对中共的予取予求,自当没有全然回应的必要。”(45页)^②尤宏的观点,与“大胆西进派”的矛盾也很明显。他说,美国将中国视为需要围堵的“假想敌”,“事实上,现阶段美国对中国所采取的乃是一种‘广泛性交往围堵’,也就是表面上交往,实质上仍为围堵的路线”,“因此,对台湾而言,当务之急并不在于与霸权心态浓厚的中国进行谈判”。(109~114页)美系提出的面对国际上、特别是美国的促谈压力,要积极回应大陆的“谈判攻势”,以免台湾被视为“麻烦制造者”的观点,也受到非美系的反对,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张旭成认为,“美国未对台施压,只是鼓励台北与北京双方尽快恢复对话。”(343页)姚嘉文在会上说,“中国、美国对台湾并不存在促谈压力,而从美国的亚太战略布局也看不出美国会单方压迫台湾;但在谈判的世界潮流下,强力抗拒谈判亦不可能”^③。颜锦福认为,“其实只要坚持到底我们是主权独立国家,我们何惧于世界各

国对台湾施加压力,要求台、中进行谈判。……何况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任何国家对台湾施加压力,要求台、中进行谈判,更没有任何第三国促使台湾接受中国的谈判条件。”(130页)林哲夫、蔡明宪、苏焕智共著的论文说,“和平解决既是美国关切所在,两岸的会谈当然是必要手段,美国鼓励两岸间的对话甚至进行政治谈判便是台海问题和平解决在逻辑上的必然延伸。如果是必然的,那么对于台湾而言,美国对于两岸谈判的期待,虽是早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但不应成为我方急迫进行谈判的藉口,何况目前美国并未对双方会谈的形式与内容作出具体的表示。”(164页)由上可见,国际促谈压力与如何应对,成了研讨会热烈讨论的议题。

根据上述引例可以认为,在民进党内关于国际观和应对策略方面,存在着如下主要分歧。

1. 世界是否已经出现“以共同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的分歧;
2. 关于美国不把中国当成敌人而当成战略伙伴或是把中国当成假想敌的分歧,即美国的中国政策是以交往为主或以围堵为主的分歧;
3. 关于国际形势,特别是当前的美、中、台三角关系的形势,对台湾有利或不利的分歧;
4. 关于国际上是否存在促谈压力,以及对促谈压力应如何看待的分歧。

就是因为上述国际观的分歧,使民进党内的两岸互动策略产生了歧见。一种意见认为,民进党应顺应国际上促进两岸对话、谈判的要求积极、主动面对大陆“谈判攻势”,以三通和经贸议题来启动谈判;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国际上并不存在为推动两岸谈判对台施压的问题,因此,可以采取能拖则拖来对待中共的促谈,以拖待变。另一重要政策分歧是:一方认为,美、中、台三角关系,愈来愈对台湾不利,台湾的筹码愈来愈少,因此民进党的大陆政策不能逆向操作,在两岸互动中出难题,违背美国追求台海形势缓和的战略目标而被视为“麻烦制造者”;另一方则认为,美对中、台是维持平衡战略,形势并没有特别对台湾不利,所以,台湾的大陆政策有很大的回旋空间和主导权。因此,台湾可以坚持“主权独立”,可以突破外交封锁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并不会被视为“麻烦制造者”,也不怕被视为“麻烦制造者”。

虽然存在着上述分歧,因为有一部分非美系的与会者经多方面考虑,并不反对两岸沟通、对话和谈判,所以研讨会基本上赞成两岸进行“全方位谈判”。

三、对大陆形势的研判及其政策分歧

民进党“中国事务部”在研讨会上分发了“1997年中国情势报告”,报告内容分别从外交、军事、经济、社会、对台政策以及政治情势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判,每部分都有简要结论,说明这些情势对台湾的影响和台湾应有的对策。客观形势是制订政策的基础,以台湾为主体的客观形势中,对其影响最密切、关系最大的是中国大陆这一客体,它又是与台湾互动的对象,所谓制订“中国政策”也就是制订有利于台湾和民进党的互动方针和策略。所以我们可以根据“1997年中国情势报告”的结论来研判民进党中央对大陆形势的认知,究竟有多少符合客观实际?对于中共对台政策的评估及其对应策略,将在两岸关系

中起什么作用?在进行观察之后,我们通过对各派系向研讨会提出的论文,就可以发现为什么民进党难以制订出全党公认的大陆政策的根本原因。各派系提出的论文,大多数都是在谈及大陆形势、国际形势和台海两岸动向之后,才提出对应策略。因此,对于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前景和世界经济潮流看法不同,就成了主张“大胆西进”或“戒急用忍”者各自的论据。对中国大陆的国际地位及其影响力大小的评估不同,也是民进党内对待两岸谈判态度产生分歧的一个因素。再如,对于中国大陆军事力量怎么估量,是“急进台独论”和“务实台独论”歧见的重要论据,前者认为解放军无力也不可能使用武力,后者认为解放军对“台独”有使用武力的可能,推行“台独”以不惹解放军使用武力为前提。总之,中国大陆形势的研判结论,是民进党中央和各派系提出“中国政策”的重要基础。

以下,我们先分析“1997年中国情势”各部分的结论之后,再与各派系提出的书面报告作对比,以探讨其政策分歧所在。

1. 关于“中国政治情势”的结论。其“总的评述”认为:中共以江泽民为中心的领导体制趋向稳固,对台政策存在着强硬与宽松的两种可能性,如何变化,与台湾的大陆政策密切相关。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民进党主流派在制订“中国政策”时,不会把达成政策目标建构在大陆动乱的基础上,推动两岸经贸方面,也少有政治风险的疑虑。“结论”强调中共对台政策变化取决于两岸互动中台湾方面的“诱因”,这一研判将成为“务实台独论”反对“急进台独论”采取冒险政策,激化两岸矛盾的理由。上述基调,与研讨会中有些人在两岸互动中,主张要求中共承认“台湾主权”为前提,或急于实行“公投”,造成两岸关系紧张的策略是不相容的。

2. 关于“1997年中国外交情势”的结论认为:“台湾的外交空间虽必须受制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主权申张所影响,但在中美强权竞逐的国际大格局下,台湾仍然拥有可以见缝插针,缝隙处处的发展空间:在与各国的非官方交往关系上,中国即难以主权为由加以干涉,而在若干经贸、文化性质的国际组织上,台湾若能活用本身具有的优势,将自己加速地融入其中,则面对愈益强大的对岸敌国,当可加增未来与其周旋的有力筹码。”若依此研判,民进党主流派制订两岸外交斗争策略时,由于认识到台湾在国际上必然会受到中国大陆的“一个中国”的主权申张的抑制,将以利用中国和美、日等国的矛盾,采取务实地在经贸、文化方面融入国际社会为上策,而不着重于突破中共外交阻力去增加邦交国和参加联合国。与此相反,有些派系的论文却夸大中国与日、美等国的矛盾,认为可利用的因素和机会很多,对台湾扩大国际活动空间,持乐观的态度,仍把扩大国际空间的着力点放在增加邦交国和参加联合国的目标上。如蔡同荣认为:“联合国,则将是我国在陆续加入其周边组织后,充分突显我国在国际间重要地位与突破外交困境后仍须戮力以赴的目标。”(47页)由上可看出因为对中国国际外交影响力的不同研判而来的外交策略分歧。

3. 关于“中国军事情势报告”的“结论”认为,虽然解放军到2010年要完成全面现代化仍有相当困难,但并非无犯台意图和能力,台湾的对策是加强国防。从结论的基调看,其对策显然是防御性的,而不是挑衅性或进攻性的。与这种基调不同,研讨会中有部分人低估解放军的战意和战力,鼓吹及早“公投建国”,个别人还鼓吹与解放军对抗搞军备竞赛,要求研制核武器和生化武器。持这类观点者,如蔡同荣认为,因受美、日的牵制及“中国内部的政经与国防实力的问题,因此目前中国尚无对台使用武力的可能。”(47页)颜

锦福主张“台湾应主动展示自己的军力,让邻国感到威胁,并积极提倡区域性安全合作组织”以“维护台海的和平。”(130~131页)由此可窥见,民进党内在对大陆军事政策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4. “中国经济情势报告”的“结论”。要点是:“1997年中国可望维持高经济成长、低通货膨胀的格局”,“若无较大的政治、社会变动,中国在未来数年可望维持较高的经济成长率。但持续恶化中的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对中国经济构成负面影响。”“中国开始对外资依产业需求进行筛选;对外出口商品则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将对台湾产业形成更激烈的竞争。”“吸收外资增加,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发展差异可能加大,但中国经济一体化也可能加深。……虽然短期内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尚称乐观,但社会的不稳定与政治的不确定因素会构成发展的障碍,故对此诸多方面皆应做深入的研究。”上述研判结果告诉人们,短期中国经济状况适合于台湾到大陆投资、发展经贸关系,将来投资环境是否会恶化,则要看中国大陆能否克服发展障碍而定。这是比较踏实的观察,有别于一些人为了实行“戒急用忍”政策,极力把大陆的经济成就贬低,夸大其发展障碍为不可克服的问题,甚至断言中国经济改革会造成社会动乱和国家分裂,夸大台湾到大陆发展经贸的风险性并为两岸互动上“以拖待变”制造藉口。如林忠正的论文突出论述中国经济发展危机,夸大粮食问题的严重性,就业问题、通货膨胀与物价问题的难以解决,以及市场经济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矛盾等。(318页)这种观点与上述“结论”的距离实在太大了。

5. 关于“中国对台政策报告”的“结论”。对中共对台政策的描述,应该说在许多方面基本上符合客观实际。中共目前确实在积极“促谈”,在设法吸引更多台商来祖国大陆投资,在设法促进实现全面三通以及使大陆的资本入台经营企业,也确实在加强经济和经济实力,以促进“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实现和排除国际上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干扰。但是“结论”也有重要的疏漏。如没有明确指明,中共的促谈是政治性谈判优先于事务性谈判,还疏漏了在外交方面的对台政策是抑制台湾“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为目标的扩大国际空间的活动。而最重要的疏漏是对于中共坚持“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定性认识不足。从这些情况就可以知道,研讨会上有些人主张以事务性议题优先来应付中共的促谈,或在政治议题上主张打“主权牌”“公投牌”,以及认为“一个中国的原则”遭到台湾不理后,“中国会自陷泥淖”的想法,都是有原因的。

6. “中国社会情势报告”的“结论”。“结论”的思维方式,应得到肯定,它以辩证、发展的观点,从正负面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状与前景。“结论”认为中国政府尚有能进行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能够以合法的手段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其主导开放改革得到了人民的肯定。将来能否向好的方向发展,避免社会不稳定,则取决于能否克服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消极因素,如人民收入差距拉大、东西区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无序、无规范,以及能否建立上下沟通的制度等问题。如将“结论”和研讨会上各派的观点对照来看,就不难发现,“大胆西进派”的中国社会观,比“戒急用忍派”的观点,更接近于“结论”的观点,“戒急用忍派”过分夸大中国开放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的严重性,个别人甚至认为将来会演变成政治动乱、国家分裂。在两岸谈判态度上,因两派的中国社会观不同,前者把谈判对手当成稳定的实体,主张目前就可进行谈判,并希望谈出结果来;后者则把谈判对手当

做不稳定的实体,其前景又不妙,所以抱着等待观察、以拖待变的态度。

经过以上把民进党“中国事务部”的“1997 中国情势报告”各部分结论与这次研讨会一部分论文的中国观,进行了对照分析,可以看出,只有一部分人的观点,赞同或接近于“结论”,多数人有不同的看法。“对中国情势的研判”是民进党制订‘中国政策’的主要基础,从民进党内对中国情势研判上的分歧,就可得知民进党要出台大陆政策,还要走多艰难的路程。

四、结束语

民进党召开“中国政策研讨会”是客观形势的需要。一是党内的大陆政策分歧明显,需要整合,以缩小分歧,加强团结;二是民进党要从在野党走向执政党,制订出一个攸关台湾生存和发展的大陆政策,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至今为止,民进党就拿不出这样的政策。民进党过去可充当国民党大陆政策的配角,或充当抗衡者,抓住其缺点或实施中的问题加以抨击而可暂缓拿出自己的大陆政策;现在临近执政的可能性增大,制订出本党的大陆政策就成为无法逃脱的一关;三是应付选举的需要。年底的“立委”选举和北、高二市选举,后年的“国代”和“总统”选举中,大陆政策是否能顺民意,对于选举胜败有相当的关系,需要有所准备。民进党中央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会整合党内意见,做为将来选举的政见,迎接选举。谢长廷说:“要紧扣台湾中长期利益,回应社会大众的期望;由于长期以来民进党一直没有明确交代中国政策,一般民众只留下民进党追求台独的印象,做为一个准执政党,必须搜寻我们的社会基础,提出具体回应。”(65 页)

研讨会的上述目标是否达到了?从整合党内大陆政策分歧这一点来说,收效并不大。对于三天研讨会的结果,“许信良说,基本上,党内四派系都能认同和中国坐上谈判桌,谈判两岸共同议题,且都认同在谈判时必须确定‘主权问题’;而对国际新秩序的看法,例如新潮流主张要交往也要围堵,无论如何,都是肯定国际新秩序的形成,且在国际间发生了作用;至于‘强本’议题的看法上,美系及新系都认同‘强本、西进’,是相互辩证的过程。”^④三天的研讨会并没有在会上做总结。许信良所谈的上述共识中,实际上只“强本”是全体的共识,这是“台湾主体精神”和“台湾优先”的体现,所以没有人反对,但是在两岸互动中,如何才能做到“强本”仍存在着分歧,“西进以强本”、“戒急用忍以强本”的问题仍没有解决。关于两岸谈判问题,只能说是多数人同意“和中国上谈判桌”。这是这次研讨会的收获。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郭正亮说,“即便是以安全考量,向来主张和大陆不接触、不谈判的新潮流系也开始面对现实处境,主张与大陆接触”。^⑤若深入一点就可以发现,在谈判中,如何处理主权问题,主权问题是否做为谈判筹码,以及什么议题做为优先议题仍有歧见。在两岸经贸和三通问题方面,美系取消了“大胆西进”中的“大胆”,而新系在承认“西进”与“强本”存在辩证关系的情况下不反对“西进”而取得整合,但对于是否以大陆为主要发展经贸对象的问题,意见并不一致。关于三通问题,美系主张尽快开放,而其他三系多把三通当筹码,要等到两岸都要加入 WTO 时再说。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民进党三天研讨会的结果,达到的共识有限,整合的功效也不宜过高估计。这一点,从许信良打算三月份发表“中国政策白皮书”的计划没有实现、以及五月份民进党“中国政策研讨会共识案”

在中常会未被通过为政策纲领,而仅定位为“参考文件”,也可以看出来。经过民进党精英三天辩论,只能形成了不具约束力的“共识”、“参考资料”,可见党内政策分歧整合之困难。这里应该指出,整合的主要难点在于各人对于制订政策的主客观条件的认识不一致,其中对分歧起较大作用的是各派对实现“台独”的诉求及其客观条件的认识不一致。这种根本性的分歧,不仅在会中明显表现出来,会后仍有所暴露。今年6月柯、江会谈后,7月1日,“民进党中常会时,主席许信良认为,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前途,等于向中国宣战,所以除非安全受到威胁,台湾不应随便举行公投。”但蔡同荣则表示不同意,认为“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先下手为强。”^⑥这里明显地表现着各人的“台独”信念和实现诉求上、以及客观条件(包括中国和国际)认识上的差异。由此可知,只有通过构建大陆政策的基础因素的整合,才能达到党内真正的统一。

但是,这次研讨会对于为准备执政而制订大陆政策的历程来说,是不可少的步骤。这次研讨会为进一步整合党内意见提供了一个基础,同时也是一种推动,也给民进党提出了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至于民进党须省思研讨、解决的重要问题,经会议总结后一定会有所发现,在这里把魏镛所觉察到的问题提出来,或许对民进党今后制订大陆政策,有所裨益。他说:“对于民进党,我也有些建言。前不久民进党举办中国政策研讨会,获得相当的好评,但遗憾的是对于‘台独’及‘一个中国’问题似是避而不谈。民进党应该深思,未来我方与中共谈判的代表团中,民进党是不可能缺席的。我方能否于谈判前掌握更多的筹码,系于是否‘有备而来’,这就得寄望全民能否在若干问题上达成一致的共识。如果民进党不愿意去深入探讨‘一个中国’问题,那又如何能达成共识呢。”^⑦

民进党召开这次研讨会,能为将来选举提供的有共识的大陆政策政见虽然不多,但这次研讨会使民进党声望提高的效应,对于将来选举上的助益,则不可轻视。这次研讨会得到普遍肯定,受到赞扬的是什么呢?

1. 大陆政策是关系到台湾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民进党能进行公开辩论,引起了台湾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受到期望改变“戒急用忍”政策,开放直接三通的民众的关注,客观上对台湾将来制订更开放的大陆政策,起了催化作用。这次研讨会,国民党、新党、建国党都有人列席,陆委会、海基会、外国驻台机构都有人到会,采访的媒体记者多达百余人,是一个影响很广泛的会议。会议上得到共识的问题、分歧问题,都会促使人们进一步去思考,去寻找恰当、完满的答案,所以其对台湾大陆政策的演变将起的作用不应忽视。

2. 民进党通过这次研讨会,受到其他政党和各界的好评,提高了民进党的形象和声望,这为将来参加各级选举的民进党候选人增加了选票吸引力。台湾《联合报》2月12日的“社论”说,“民进党这次中国政策研讨会最应受到肯定的是其民主精神。就会前所见各方意见来看,其中甚至出现南辕北辙的歧异观点,却能同时付诸公评,实为民主精神的高度表现”。

注:

①⑤⑭ 台湾《民众日报》1998年2月15日第二版。

②⑥⑦⑧⑨ 台湾《民众日报》1998年2月16日第二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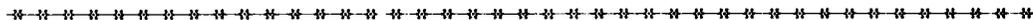
(下转第64页)

3. 如何由中央主导,协调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系统地提出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兼顾全台与地方县市利益的产业政策及具体处理模式。改变以往财经方面的政策及具体问题由“立院”党团和党籍县市长决定而造成各自为战且时而相互冲突的局面;改变以往执政县市的地方利益与全台产业布局及大企业投资的尖锐对立且中央无法从中协调的尴尬状况;改变以往产业政策方面的基本主张与具体产业个案问题处理的矛盾及引起的争议;改变以往在具体产业问题处理上的政策主张与业界或地方建设的利益落差而造成争执不下和摇摆不定的态度,才能展现民进党在迈向全面执政道路上总体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为此,作为基础性工作,民进党若能就产业政策制订和自身的“经济转型”进行内部的政策与路线的整合,即可以避免流于形式主义和仅仅停留于宣示性质。

注:

- ① 台湾《联合报》,1997年11月24日。
- ② 台湾《中国时报》,1998年4月25日。
- ③ 台湾《民众日报》,1998年4月27日。
- ④ 台湾《联合报》,1998年4月25日。
- ⑤ 此议题讨论情况参见台湾《中国时报》,1998年4月25日。
- ⑥ 此议题讨论情况参见台湾《民众日报》,1998年4月26日。
- ⑦ 此议题讨论情况参见台湾《民众日报》,1998年4月27日。
- ⑧ 会议共识及闭幕情况参见台湾《民众日报》,1998年4月27日。
- ⑨ 台湾《中国时报》,1998年4月25日。
- ⑩ 台湾《联合报》,1997年12月14日。
- ⑪ 台湾《中国时报》,1998年4月25日。
- ⑫ 台湾《联合报》,1997年12月15日。

(责任编辑 林长华)



(上接第57页)

- ③ 台湾《民众日报》1998年2月14日第二版。
- ④ 台湾《民众日报》1998年2月13日第二版。
- ⑩ 台湾《民众日报》1998年2月16日第三版。
- ⑪⑫ 台湾《民众日报》1998年2月14日第三版。
- ⑬ 台湾《民众日报》1998年2月16日第一版。
- ⑮ 台湾《联合报》1998年2月14日第三版,“成熟政党与轻率政客”。
- ⑯ 台湾《民众日报》1998年7月3日第九版。
- ⑰ 台湾《联合报》1998年6月28日第十四版,“解读柯江会:台湾的机会与选择座谈会”。

(责任编辑 林 劲)